

徐铸成

风雨故人

徐
铸
成

风与人的

王遂芳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7733

1037733

封面题字 王遽常

封面设计 池长尧

风雨故人

徐铸成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625 插页6 字数360,000 印数0,001—8,5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94 定价: 2.85 元

前 言

我正在赶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已开始《中国建设》中文版上连载,成书后将由三联书店出版),估计将写十二万字。

有人说,职业与寿命颇有关系。比如,书画家多长寿,因为写字、绘画时,陶情养性,心气平和,忘怀一切身边俗务,甚得养生之道。音乐家则弹唱时多激情,百脉贲兴,极易损害健康。新闻记者日夜操心时事,工作往往至深夜,生活秩序反常,加上直言易于贾祸,所以长寿的也极少。想想也很有道理。约略算一下,过去的卓越报人,王韬享年最长,六十九岁,张季鸾只五十四岁,戈公振四十五岁。而死于非命的,黄远庸才三十二岁,邵飘萍四十二岁。和我同辈或年事较轻的,邓拓、金仲华都不过五十多岁。范长江、孟秋江、浦熙修还不到五十,都已成为古人了!恁逸群历尽坎坷,熬到了七十多岁,重见光明,而空怀报国、报党的壮志,饮恨离开了人间!

在伏案写作时，这些可敬的前辈和朋友的光辉业迹和音容笑貌，时常“跳”入我的脑海，萦怀不已。我在“那个”二十年中，也有类似的遭遇，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从泥土里重新“发掘”出来。从此，我立下了三“不”主义：一，不计较过去；国家有了光明的前途，一切个人遭际、冤屈、苦难，算得了什么！都该付诸汪洋大海。二，不服老。我虽年近八十，但体力尚健，记忆力还未严重衰退，应在“来日苦短”之年，把认为值得留下的东西——诸如史料、佚闻以及经验教训，凡可以为四化建设有用的残砖片瓦，尽量多留些下来，供后人参考。三，不自量力。尽可能多为新闻界——大众传播事业，作育些人才。已进入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社会时代，对电脑等新的传播工具以及相适应的传播技能、艺术，我自己还要从头学起，只能不揣愚妄，不自量力，多搭些桥，铺些路，为后来者指引些正道。如此，为无限美好的国家前途——振兴中华，发挥一些余热。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大都为怀念故人之作。其中，有些还健在，夙兴夜寐地尽瘁国事。而大部则已作了古人，而且，多半是在那个十年中，受迫害离开人间的（金仲华、平心、傅雷、傅东华、范旭东等的悼文，已收入别的书里，这里不重复了）。写时，除伤感以外，不免带一点悲愤的笔调。我认为，这和不计较过去是两回事。记得恽逸群同志生前曾给他的好友张建良一封信，大意说，“弟之遭遇，匪言可宣，但生平以‘不为己忧，不为物移’自律。我所经过的桥，比常人所走过的路还长，有责任把这些教训写下，使后之从政者‘明夷待访’，再不要蹈此覆辙，国家再也经不起如此的折腾了。”所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日益安定团结，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今后决不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彻底否定“文革”，把所谓“四大自由”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历史上曾有过漫长的恶梦，付出过的多么惨重的代价！永远记取是会有好处的，这也是一门“忆苦思甜”的教育吧。

一九八〇年我在港写的一组悼亡友的短文中，当时有些是出了“格”的，如《潘杨事件》，那时这件冤案尚未伸雪，我了解这些同志的过去，也清楚中央正在认真仔细地复查。所以，大胆“秉笔直书”了，这该是不足训的。现在事过境迁，仍加收录，为的是说明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多么符合党心民意。

本书所收的另一部分，是近年所写的时事性杂文，如《小楼散记》。前几年写的，已收入拙著《旧闻杂忆补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这里是近两年来的。我特别把《路与车》等三篇提出来，另加标题，是因为当时正在“批污”风云初展之际，有些习惯势力正在掀起滚滚风浪，一时有乌云翻腾之势。我写时曾冒抗“风”的危险，而《新民晚报》敢于一字不易刊出，说明要办好一张报，编者是该有一定的胆识的。

游记和通信部分，大部是在海外报刊发表的。由于“口味”不同，理解有差异，文风和格调上和为国内读者写的该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总的“口径”是一致的，报道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事物、新气象，有时也回忆过去，作为对比。也着重宣传国内实事求是的精神，着重在宣扬事实，不引口号。吁望祖国统一，宣传爱国主义，也是如此。所选的是一九八一

年迄卅五周年国庆以前之作，供读者浏览。

从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已写了不少书，连编次的旧作——如将出版的《评论选》、《通讯·游记选》等，这本，大概已是第十几册了。所以“争分夺秒”地自我“抢救”，因为毕竟已是近八十的老翁了，精神虽还好，但大脑皮层大概象筛子一样，网孔越来越大，有些前几年记忆很清楚的人和事，现在有些模糊，必待“清夜自思”，才能想得周全。有些很常用的字或成籍，竟一时写不出来，往往去请教老伴，她成了我离不开的“一字之师”了。

估计再写两年，腹中的“存货”也差不多掏空了。那时，我已过了八旬整寿，而祖国将更加繁荣兴盛，现代化的美丽前景更加清晰，我打算基本搁笔，欢度晚年了。

徐铸成

一九八四年国庆日写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正篇

永远的怀念	3
附：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怀念浦熙修同志	16
怀念姚溱同志	23
悼潘汉年同志	29
忆吴砚农兄	
——大公报的第一个党员	32
寿叶圣陶先生	36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	40
可贵的自信	
——忆周叔弢先生	47
忆钱宾四先生	50
报人楷模	
——追怀恽逸群同志	56

桃李不言

——探望侯外庐先生..... 58

李书城与孔庚

附：首义馆怀旧..... 60

和梁厚甫兄通信 65

发光的砂子

——悼战友胡星原同志 69

悼念亡友文一组 72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99

我采访蒋介石 107

忆阮玲玉 112

忆严独鹤 115

忆江南 121

第二部分 山河、人物

杂文三则 125

第一次游南京 130

第一次游苏州 133

武汉游踪 136

小楼散记 141

我不知老之将至 195

漫谈新闻教育 200

第三部分 游记与随感

原
书
缺
页

第一部分 正 篇

永远的怀念

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和《新闻战线》先后选登了毛泽东同志八篇过去未发表过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供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其中,有一篇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作为亲聆教诲者之一,我读了感念尤深。

这次谈话,是我终身难忘的。当时和前后的经过,迄今如在目前;但毕竟已事隔近三十年,我的记忆力又在衰退中,现在回忆起来,有些细节已记忆不周全,有的则不必或不宜加以详述。比如,“谈话”的第三段:“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这段话,其实也是指的《文汇报》,是毛主席见到我后,握着手谈的。他老人家还接着说了一大段鼓励和肯定的话,就没有必要详谈了。

上海被邀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有约三十位,都是文化、教育、文艺界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由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带队。还有一个后来以“咬人”闻名,并曾在十年

动乱中煊赫一时的人物，当时是个小干部，大概是随同去做些事务工作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百万庄招待所。到京的第二天上午，即去政协礼堂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即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蓝本，大家很兴奋。几个月后发表，内容则多相背，这应是参加者所尽知的。

以后有几天，上下午都详细学习和热烈讨论了“讲话”。有一个后来也曾煊赫一时的某“老”，还曾来作了一个“启发报告”，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因为离市中心太远，我又想和浦熙修同志等驻京记者谈工作，三天以后，就搬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居住。

三月十日下午一时许，《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同志赶来，匆匆地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赶快去吧。”我连忙上了他的汽车，直驱中南海。

当时毛主席的住所，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还有些剥落未修。会客厅中，只有一张长桌，四周是普通的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我惊讶不置。

他老人家先在会客厅前和前来谒见的同志一一握手、谈话，除我和杨永直同志外，新闻界还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诸同志，出版界只记得有舒新城同志。

陪同接见的有哪几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没有周总理，也没有刘少奇同志和其他政治局领导同志，连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也没有参加。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同志是最后赶来的。记得毛主席还风趣地说：“钱武肃王的后人来了。”

大家入座后，是上面提到的那一“老”先开口：“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主席的，请提出。”默然了约十分钟。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谈谈。”我就说：“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很难掌握，怕抓紧了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怎么办好？”

毛主席含笑而慈祥地详细谈了约半小时，要点就是《同新闻出版界的谈话》的第一段。

以后，主席又问：“你们在开展‘双百’方针中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们的报纸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后，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了猛烈的围攻（注）。于是，别人有意见也不敢再提了。我的想法是：最好让人家把意见都谈出来，再开展讨论，就会得出较正确的结论。”

主席的答复，大意就是《谈话》中的第二段。记得他老人家还说：“请周扬同志给你们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的意见如何？”我连忙点头，由衷敬佩主席的安排。

以后，其他同志先后提出问题，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见《谈话》的其他各段。

那次接见后的第二天晚上，上海来的同志开了全体会议，由陈望道同志传达主席接见教育界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的上海文化局长）传达主席接见文艺界的谈话；由我传达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谈话。上述的那个“小干部”正坐在我旁边。我传达完后，还笑着对他说：“主席在讲话中，还提到你

的名字表扬了你呢。”他满脸通红，含有喜色。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三天，我就出国，被任为访苏代表团团长，去苏联参观了十个加盟共和国，历时五十天，五月下旬回国时，“大鸣大放”的高潮已过去了。

还记得出国前夕，邓拓同志——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新闻协会主席曾对我说：“我根据中央的意见，已关照徐晃同志（团的临时党组书记兼副团长）：除了纯粹讨论党内问题外，党组会议，都要请团长列席。”

我对党，对毛主席，真是感激涕零。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注：当时张春桥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组织了这次围攻。

附

毛泽东同志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¹⁾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象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